

• 专题研究 •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转变 经济发展方式理论的演进历程

张连辉 赵凌云

〔摘要〕计划经济时期中国逐渐形成了传统型经济发展方式。从 1978 年起，中国共产党开始有意识地系统探索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并先后提出了经济建设新路子、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等三种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理论。在探索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关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涵、重要性与转变方式的认识都不断深化。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有望迎来一个加速推进的时期。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改革开放以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理论演进

〔中图分类号〕F120.3；D23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3815(2011)-10-0064-12

Evolution of the CPC's Ideas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Pattern since the Initiation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Zhang Lianhui & Zhao Lingyun

Abstract: China gradually formed the traditional mod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planned economy period. Since 1978, the CPC has consciously and systematically explored how to transform the mod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uccessively proposed the three theories for the transformation: blazing a new path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realizing a fundamental shift in the mode of economic growth and accelerat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pattern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process of exploration,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has gradually deepened its understanding of the connotations, importance and ways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pattern. At present, China's transformation in this regard is expected to usher in a period of acceleration.

经济发展方式，是实现经济发展的方法、手段和模式，它不仅包含经济增长方式、经济要素组合方式，还包括经济结构、收入分配、环境保护、社会保障等结构性内容。各国发展的历史经验证明，经济发展方式总是在特定社会制度、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战略等诸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伴随历史条件的变化，经济发展方式必然需要作出相应调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逐渐形成了传统经济发展方式。随着传统经济发展方式的历史使命的基本完成和历史条件的转变，传统经济发展方式越来越不利于经济发展，越来越需要转变。尽管直到 2007 年中

共中央才正式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命题，但实际上，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理论和实践探索，早在 1978 年和 1979 年就已开始。正如江泽民指出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思想，“早在改革开放之初就已明确提出”^①。而且从当时的理论和实践探索的实际指向和归宿看，就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也正是在 1978 年以来的一系列持续探索的基础上，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理论才逐渐萌生、发展并最终形成。本文试图在

^① 《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人民出版社，1999 年，第 1462 页。

回顾中国共产党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思想演进历程的基础上,探寻其内在逻辑及经济发展方式迟迟未能实现根本性转变的原因。

一、前提:传统经济发展方式的形成与改革开放前改进经济发展方式的努力

1978年之前,中国逐渐形成了以高积累、高消耗、高速度、高污染、低消费、低效率、低效益为特征的传统经济发展方式。这种经济发展方式主要是“一五”计划以来推行的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以及急于求成的指导思想决定的。

为了尽快摆脱落后局面,尽早实现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目标,1953年至1978年间,中国制订并实施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同时构建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此战略和体制下,工业企业不能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因而缺少加强技术革新、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激励;农业生产领域,平均主义、“大锅饭”则严重影响了农业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为了集中有限资源优先发展重工业,不得已牺牲了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造成了重工业过“重”,轻工业过“轻”,农业发展长期滞后的不合理产业结构,影响了整体经济效率的提高;重工业的资本密集型特征,则导致了高积累、低消费,居民生活水平长期停滞不前的状况;优先发展重化工业,则使中国在工业化之初即面临较大的环境压力。同时,在急于求成的“左”的思想指导下,为了实现赶超目标,一再强调提高经济增长速度,因而重“量”不重“质”,过于追求“多、快”,严重忽视“好、省”。正是在上述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传统经济发展方式逐步形成,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影响着中国经济发展的绩效。

当然,尽管传统经济发展方式存在诸多弊端,但其形成仍有其内在历史逻辑。无论从在薄弱的经济基础上谋求国家工业化目标的角度来看,还是从保证国家安全的角度而言,传统经济发展方式的形成都有其历史合理性,发挥了积极的历史作用。然而,随着历史条件发生

较大转变,及其弊端的日益显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历史要求日益迫切。

1978年之前,党和国家领导人已经发现了传统经济发展方式存在的一些弊端,并试图弥补之。比如,中共八大前后,毛泽东、刘少奇、陈云、薄一波等中央领导人提出了兼顾积累与消费,兼顾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按比例发展国民经济等思想。在诸多弊端中,最突出也最为当时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所关注的是低效率。实际上,1978年之前,为了摆脱资源短缺的约束,中国政府始终将“好、省”即高效率作为经济建设的重要目标,并为提高效率进行了长期的努力。譬如,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发动、此后每隔几年(“文化大革命”时期也不例外)都要出现一次的增产节约运动和“比学赶帮”(比先进、学先进、赶先进、帮后进)运动,即是中国共产党试图提高效率的重要手段和形式。50年代,中央还曾向全国推广“马恒昌小组”、“郝建秀工作法”、“倪志福钻头”等高效生产的先进典型,以期提高生产效率。在宏观层面,1951年底发动的“三反”运动,可视为从宏观经济管理层面寻求提高经济效率的初次努力。传统计划经济时期,为了摆脱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低效率状况,在经济管理体制上,又先后两次进行了下放经济管理权限的改革。以上都可视为1978年前中国共产党为提高生产效率所采取的措施,也可以视为在改进经济发展方式上采取的措施,只不过这些措施多是以运动或行政的方式推行的。

然而,上述努力未能达到预期效果,到1978年,中国经济增长集约度和效率依然非常低下^①。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传统经济发展方式是传统发展战略和传统经济体制以及急于求

① 综合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比较通用的表示经济增长集约度的指标。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一般以综合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为标志。1953年至1977年,以该指标表示的中国经济增长集约度极低,甚至有经济学家认为只有0.16%,远低于20世纪初的世界平均水平(5%—20%)。见张军扩:《“七五”期间经济效益的综合分析》,《经济研究》1991年第4期。

成指导思想的产物，如果不突破这种战略、体制和指导思想的藩篱，人们难以从主观上充分认识这种发展方式的弊端，也难以从实践上推进其根本性转变。因此，1978年之前，中国共产党没有有意识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最多只是试图改进经济发展方式。这也意味着，要想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必须首先突破发展战略、经济体制与指导思想的藩篱。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出现了一次清算经济建设中长期存在的“左”的思想，深刻反思原有发展方式的历史契机。但1977年纠“左”刚刚开始，中央决策层又出现急于求成的思想倾向，认为国民经济“新的跃进”形势已经到来。于是，在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状况尚未扭转，各种经济关系尚未理顺的情况下，制订了脱离国情的发展国民经济的《一九七六年到一九八五年发展国民经济十年规划纲要（草案）》，以推进国民经济“新跃进”。为实现“新跃进”提出的高指标，再次大幅提高积累率，并且超越国力和财政承受能力，大规模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设备和资金，迅速加剧了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状况和各方面关系的紧张。传统经济发展方式蕴含的问题再次充分暴露。当时党和国家一些主要领导人认为，国民经济出现的困难，是经济发展道路的问题，于是开始冷静、理性、系统地反思原有的经济发展道路，并在反思中寻求新的经济发展道路，从而正式拉开了探索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帷幕。

二、起源：探索“经济建设新路子”

“新跃进”造成了国民经济严重困难，最终促使当时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开始在反思中探寻新的经济发展道路。这也是中国共产党有意识地系统探索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开端。经过三年多的探索，通过“八字”方针的提出和实施，到1981年底召开的五届人大四次会议，中国共产党完整地提出了一条“经济建设新路子”，标志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探索取得了第一个阶段性理论成果。

尽管传统经济发展方式存在的弊端很多，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涉及的范围很广，但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初期，传统经济发展方式所表现出的最突出的弊端以及当时党和国家领导人最关注的问题，是经济低效益和居民生活水平增长缓慢两大问题。因此，对经济建设新道路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探索主要是围绕如何解决这两大问题展开的。

（一）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初步探索

在初步探索阶段，对经济发展道路的反思，是从强调按经济规律办事以及提高管理质量和经济效益入手的。尽管对经济发展新道路的探索破题于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但1978年的集中思考及采取的相关措施，却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及此后经济发展新道路的探索，做了直接的思想准备，从而成为经济发展新道路探索的有机组成部分。1978年6月7日，李先念在听取全国物价会议情况的汇报时指出“按质论价、优质优价要严格执行，只有这样才能提高产品质量，促进企业尽快改变管理工作落后的状况。如不坚持这个原则，不按价值规律办事，产品就会粗制滥造。”^①6月20日，华国锋在全国财贸学大庆学大寨会议上提出要正确利用价值规律的问题。随后，在1978年7月至9月召开的国务院务虚会上，李先念进一步指出：“我们二十八年经济建设的经验证明，要高速地协调地发展国民经济，就一定要遵循客观经济规律，首先是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搞好综合平衡。”“一定要给予各企业以必要的独立地位，使它们能够根据经济本身的需要，自动地而不是被动地厉行经济核算，降低消耗，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资金利用率，提高经济效益。这就需要在经济管理中充分注意企业的经济权限和经济利益，认真实行按劳分配，善于运用经济手段，而不要滥用行政方式，或用行政层次、行政区划的框架去束缚经济的发展。”^②上述观点表明，当时的党和国家主要

^① 《李先念论财政金融贸易（1950—1991年）》下卷，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2年，第335页。

^② 《李先念论财政金融贸易（1950—1991年）》下卷，第368、375、376页。

领导人开始强调遵循经济规律按比例发展国民经济，这是对无视经济规律的急于求成思想的否定，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探索突破思想的藩篱，打开了突破口。同时，当时的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显然也更加关注经济效益的提高，而且，在提高经济效益的方式上，已不再主张使用运动或行政的方式来推动，转而强调运用经济手段和价值规律，通过使企业获得自主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内在动力来提高经济效益。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在提高经济效率和效益的思路已经开始出现重大转折。显然，该转折源于经济发展要按照经济规律办事这一重要认识，这也是对新中国成立 20 余年来经济建设经验教训的总结。正是这一重要认识，正式开启了探索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闸门。因为，按照经济规律办事，不仅要求转变提高经济效率和效益的思路，更要求转变发展战略、经济体制、发展机制以及发展目标等经济发展方式的诸面向，并最终要求对经济发展方式进行根本性转变。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其实就是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的内在要求和必然结果。

当然，当时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此还未形成充分而清晰的认识，既未明确表达转变经济发展道路的意图，更未形成一个清晰的转变思路。但确已初步认识到，只有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才能摆脱原有的经济发展道路，而若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就必须转变经济体制和经济工作的目的与标准，从而已初步向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理论纵深拓展。比如，在 1978 年的国务院务虚会上，李先念明确提出“要改革一切不适应生产力的生产关系，改革一切不适应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① 同年 9 月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则提出，要实现从那种不计经济效果、不讲工作效率的官僚主义的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转到按照经济规律办事、把民主和集中很好地结合起来的科学管理轨道上来^②。从而初步提出了通过改革经济体制转到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上来和提高经济效益的思想。而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指出“看一个经济部门的党委善不善于领

导，领导得好不好，应该主要看这个经济部门实行了先进的管理方法没有，技术革新进行得怎么样，劳动生产率提高了多少，利润增长了多少，劳动者的个人收入和集体福利增加了多少。”^③ 将经济效率和劳动者收入水平的提高作为评判党的经济工作成效的标准，是对以往重“量”不重“质”的评价标准的否定，为全党探索经济建设新道路，进一步打开了思想空间。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还针对以前重积累、轻消费、居民生活水平提高缓慢的状况，提出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并通过示范效应，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的思想。这种让劳动者共享经济增长成果的思想，逐渐成为“经济建设新路子”的重要内涵。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探索，虽然时间短暂，理论成果有限，但却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和历史地位。因为，尽管 1978 年之前已有少数人提出过遵循价值规律、提高经济效率和改革生产关系等思想，但 1978 年重提这些思想，却与此前有本质差异。此时的探索已开始试图突破战略与体制的藩篱，已然为改革开放奏响了序曲。而且，这一探索取向基本上已成为中央决策层的共识，并进而影响和决定中国经济政策和经济发展路径的未来走向。事实上，正是这一时期的探索，为“改进”经济发展方式的探索转向“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探索，校正了方向，发动了引擎，并做了最初思想和理论准备。因而，该阶段既是反思经济发展方式的思路的重大转折期，也可视为系统探索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总前奏。

（二）在国民经济调整中的加速探索与完成

正是在前述探索基础上，1978 年底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系统总结了以往经济建设中的盲目追求高速度、不注重经济效果

① 《李先念论财政金融贸易（1950—1991 年）》下卷，第 376 页。

②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管理大事记》，中国经济出版社，1986 年，第 320 页。

③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2 年，第 29—30 页。

的问题，强调应该坚决实行按经济规律办事，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批判了对人民生活中的迫切问题漠不关心的官僚主义态度，指出城乡人民的生活必须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逐步改善。尤为重要的是，这次会议做出了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的决定，正式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帷幕。此次会议为经济发展新道路的探索突破经济体制的藩篱，以及国民经济真正走上新的发展道路，迈出了关键一步。此后，对“经济建设新路子”的理论探索开始加速推进，同时，以此为起点，中国共产党也开始探索从实践中推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对“经济建设新路子”的第二阶段探索，主要是在国民经济调整过程中进行的。1979年4月，中共中央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制订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新八字方针”，开始着手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这次会议第一次明确提出“一定要从自己国家的实际出发，走出一条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实现现代化的中国式的道路。”^①这实际上是在初步提出要走一条“经济建设新路子”的思想的同时，用“现代化”取代“工业化”作为前进方向，即初步表达了转变经济发展战略的意图和新的发展战略目标。国民经济调整实质上也成为推动国民经济走上新路子的的重要手段。

此后，随着国民经济调整的推进，寻求“经济建设新路子”的思路日益清晰，同时，当时的领导人已在考虑如何在调整过程中推动国民经济走上新的建设道路，即探寻“经济建设新路子”的实现途径。1980年1月，邓小平在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在发展经济方面，正在寻求一条合乎中国实际的，能够快一点、省一点的道路，其中包括扩大企业自主权和民主管理，发展专业化和协作，在计划经济指导下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先进技术 and 中等技术相结合，合理地利用外国资金、外国技术等等。”^②这一讲话在比较清晰地表达了要寻求“经济建设新路子”的思想的同时，比较明确地阐述了“新路子”的具体实现途径，也暗含了要将经济体制改革作为“新路

子”的根本实现途径的思想，为“新路子”的探索指明了具体方向，进一步推动了对“新路子”的探索。

在前述探索的基础上，1980年12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认真反思了以前“重基建轻生产、高积累低效率的道路”，提出“今后再也不能走这条老路了。我们应当寻找一条新的路子”。这条新路子，“不是靠多上基本建设，多铺新摊子，大量增加能源和原材料的消耗，而是主要靠发挥现有企业的作用，进行合理的技术改造，降低消耗，提高质量，提高效率，来扩大社会生产。这条路子，速度可能不那么高，但是经济效益会好，社会财富会增加得多，人民得到的实惠也会多。只有走这条路子，才能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口多、底子薄的国家，处理好积累和消费的关系，处理好发展生产建设和改善人民生活的关系，从根本上解决财政经济的困难，求得经济的稳定增长”。^③要寻求一条“经济建设新路子”的思想已清晰表达出来。同时，此次会议进一步批判了急于求成的思想，并首次明确提出要通过经济体制改革，从根本上提高经营管理的水平 and 经济活动的效果。这实际上就是明确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途径。不难发现，“新路子”的核心就是经济高效益和人民共享经济增长的成果，而其根本实现途径则是经济体制改革。至此，“经济建设新路子”理论已基本形成。

此后经过近一年的国民经济调整和理论探索，中国共产党对“新路子”的内涵和实现途径的认识进一步深化，最终在1981年11月召开的五届人大四次会议上，进行了全面总结和阐述。五届人大四次会议提出“真正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走出一条速度比较实在、经济效益比较好、人民可以得到更多实惠的新路子。”^④

①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125页。

②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314页。

③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620—621页。

④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006页。

为了走出一条“经济建设的新路子”，就必须围绕提高经济效益，认真贯彻执行下列十条方针：依靠政策和科学，加快农业的发展；把消费品工业的发展放到重要地位，进一步调整重工业的服务方向；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加强能源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建设；有重点有步骤地进行技术改造，充分发挥现有企业的作用；分批进行企业的全面整顿和必要改组；讲生财、聚财、用财之道，增加和节省建设资金；坚持对外开放政策，增强我国自力更生的能力；积极稳妥地改革经济体制，充分有效地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提高全体劳动者的科学文化水平，大力组织科研攻关；从一切为人民的思想出发，统筹安排生产建设和人民生活。这“十条经济建设方针”充分阐述了“新路子”的具体内涵与实现途径，标志着1978年以来寻求经济发展新道路的探索正式完成，也标志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探索取得重大理论性进展。

（三）“经济建设新路子”理论的特征与历史地位

综上所述，从1978年到1981年底的五届人大四次会议，经过三年多的探索，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一条“经济建设新路子”。这条“新路子”主要是针对此前由于长期推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传统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急于求成思想，所导致的经济低效率、低效益以及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缓慢的状况提出的。因而，要走上“新路子”，就必须突破发展战略、经济体制与指导思想的束缚，从而选择了经济体制改革作为走上“新路子”的根本实现途径。在国民经济调整的背景中，为了具体指导经济建设走上“新路子”，党中央又提出了“十条经济建设方针”作为“新路子”的具体实现途径。从内涵来看，“新路子”涉及速度、效益和实惠三者的关系，主要目标是经济高效益和人民共享经济增长成果。由此来看，尽管当时尚未明确提出经济增长方式和经济发展方式的概念，但就内涵来看，“经济建设新路子”实质上就是要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乃至经济发展方式。而且，因其同时强调人民应能共享经

济增长成果，这也就使其超越了“增长”内涵，表现出明显“发展”指向。因此，从内涵来看，“经济建设新路子”已初步具备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理论的诸多特征。

不过，由于“经济建设新路子”主要是在国民经济调整过程中提出的，首先服务于国民经济调整，而且它也只是中国共产党有意识探索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开端，故从其理论特征来看，只是初步表达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思想，尚称不上一个系统的理论。譬如，当时中共虽表现出转变发展战略的意向，但未明确提出要转变经济发展战略；虽开始经济体制改革，并将其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根本实现途径，但未明确改革的方向，实际上仍将计划经济作为转变发展方式所需的体制环境；也没有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推进机制。

尽管如此，“经济建设新路子”的历史作用是重大的。一是它标志着中共开始系统认识传统经济发展方式，开始探索转变这种发展方式，并为此后更深入地探索奠定了重要思想基础。二是正是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在要求出发，提出了改革开放的要求；改革开放也就成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手段和结果。

三、发展：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

“经济建设新路子”提出之后，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努力推动经济建设走上“新路子”的同时，继续推进相应的理论探索。1995年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基于新的探索和新的历史条件，提出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思想，标志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关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探索取得了第二个阶段性理论成果。

（一）十三大前对“经济建设新路子”理论的进一步探索与深化

如前所述，“经济建设新路子”理论尚不是一个系统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理论，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系统和深化。在中共十三大之前，探索的不断系统和深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提出“三步走”战略，明确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战略基础。在提出“新路子”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是调整国民经济，因而虽出现转变经济发展战略的意向，但并未提出新的发展战略。“新路子”提出后，为了更好地推动经济建设走上“新路子”，中国共产党开始构建新的经济发展战略。1982年9月召开的中共十二大在要求“把全部经济工作转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的同时，首次提出了“两步走”战略。“两步走”战略的目标是，到20世纪末，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使中国现代化取得重大进展和人民物质文化生活达到小康水平。显然，“两步走”战略不仅与“经济建设新路子”具有精神上的一致性，而且已比较明确地提出了新的发展战略目标——现代化和奔小康。这标志着新的经济发展战略初步形成。在此基础上，1987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三大又提出“三步走”战略。“三步走”战略实际上是“注重效益、提高质量、协调发展、稳定增长的战略”^①。“三步走”战略既与“两步走”战略一脉相承，又具有更长远的战略目标和更清晰的战略内涵。“三步走”战略的提出，标志着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已实现根本性转变，新的、更契合“经济建设新路子”的经济发展战略正式形成。这也使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探索，基本摆脱了赶超战略的束缚，为更深入的探索，创造了重要条件。

其二，经济体制改革的市场化取向日益明显，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体制环境日益明确。从1982年中共十二大提出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到1983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到1987年中共十三大提出的“政府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尽管改革的目标模式尚未真正突破计划经济体制的框架，但经济体制改革的市场化取向日益明显，国民经济也日益市场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体制环境逐渐具备。

与此同时，“经济建设新路子”在实践中取得了明显成效。1982年，国民经济调整基本完成，改革开始全面铺开，中国经济进入新一轮

发展时期。经过近十年的改革，市场配置资源的范围日益扩大，市场化进程加速推进。通过改革收入分配体制，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居民收入水平大幅提升，到20世纪80年代末，人民的温饱问题已基本解决，“经济建设新路子”的重要目标——人民共享经济增长成果——得到了比较好的实现。

但是，经济增长集约度却因经济发展战略仍残留赶超特征、经济体制转轨中的剧烈磨擦、国民经济尚未摆脱短缺局面以及宏观调控体系不健全等原因，到80年代末，经济效益虽有明显提高，但仍然较低，经济增长仍较粗放^②。这一时期尽管中央一再要求提高经济效益，但经济效益低下依然是国民经济发展中的突出问题。于是，随着人民温饱问题的基本解决，如何有效提高经济效益，就成为首要任务。

正是基于对这一经济发展中的主要问题的准确把握，1987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三大认为，经济效益太低是各种经济矛盾的焦点，而要提高经济效益和实现“三步走”战略的第二步战略目标，就必须将经济发展从粗放经营为主逐步转到集约经营为主的轨道上来。从而在党的重要会议上首次提出了转变经营方式的思想。从提高经济效益角度来看，转变经营方式的理念，比“经济建设新路子”具有更加明确的战略基础和体制环境要求，理论表述也更精炼、更准确，是理论上的一次提升和深化，为此后提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作了重要理论铺垫。转变经营方式的提出，标志着“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理论第一阶段探索的完成。

（二）十三大后的进一步深化和“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理论的形成

十三大后，探索又进一步深化和拓展。

① 《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7页。

② 1978年至1989年，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虽提高到28.73%，但距50%仍相差甚远。见张军扩：《“七五”期间经济效益的综合分析》，《经济研究》1991年第4期。

首先,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明确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体制环境。在上述经济体制改革探索的基础上,1992年中共十四大正式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体制改革的市场化方向基本确定。1993年11月召开的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要求在20世纪末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而以党的重要决议的形式,最终确立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市场化方向。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出,最终明确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根本途径是市场化改革,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应在市场经济环境中进行乃至完成。

其次,提出科教兴国战略,将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探索推进到技术层面。进入90年代之后,随着制约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战略与体制环境逐渐消解,有利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战略与体制环境逐渐形成,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探索,逐渐从体制层面,深入到技术层面。1991年3月,李鹏在七届人大四次会议上所作的《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第八个五年计划纲要的报告》中指出,为了提高经济效益,“就要真正把发展科技和教育放在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使经济建设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①。强调应依靠科技进步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即技术层面的要素质量的提高,来提高经济效益,比“十条经济建设方针”更深刻地把握住了提高经济效益的关键所在,是对如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认识的一大深化。1995年5月6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在重申要把经济建设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的同时,提出了科教兴国战略。从而进一步从战略的高度,指出了科技进步和要素质量的提高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意义。

在转变发展方式探索不断深化的同时,探索的范围也在不断拓展。这突出表现在生态环境开始被纳入到发展方式转变所需考虑的范围。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生态环境问题的日益凸显,

协调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保护的矛盾,逐渐被纳入转变发展方式新探索的视野。1979年以来,环境保护日益受到重视,1983年环境保护还被正式确立为一项基本国策。但生态环境状况,却因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发展方式转变的滞后而不断恶化。90年代初,鉴于日益严重的生态环境破坏对居民健康和经济发展的巨大影响,中国共产党开始从战略高度审视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问题。1992年8月,经国务院批准的《关于出席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的情况及有关对策的报告》,提出要施行可持续发展战略。这是在中央文献中首次提出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概念。1994年3月中国政府制定完成并批准通过了《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确立了中国面向21世纪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总体框架和各领域的主要目标,并将其作为各级政府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的指导性文件。同年7月国务院发布第37号文件,再次要求各级政府和部门将《议程》作为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的指导性文件,将《议程》的思想纳入到各项计划和规划中去。可持续发展战略基本形成。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是中国共产党在协调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关系上,作出的一个重大战略决策,是从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角度,对“三步走”战略的重大发展,它也使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探索向环保维度拓展。

在此过程中,中国经济经历了从高涨到疲软,从卖方市场逐渐转变为买方市场的重大转变。其间,经济增长集约度提高缓慢、经济活动效益太低的问题更加突出。这意味着,提高经济效益仍是新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理论的核心诉求。

在前述探索不断深化和拓展的基础上,以及在新的历史条件下,1995年5月26日,江泽民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以粗

^① 《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504页。

放经营为主的经济增长方式尚未根本改观”^①。这是在中央领导人的讲话中首次使用“经济增长方式”的概念，同时提出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要求，标志着新的发展方式转变理论的初步形成。同年9月召开的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实现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一是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二是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这是在党的重要会议中首次使用经济增长方式概念及提出实现其根本性转变的理念。经济增长方式概念比“经济建设新路子”更具有科学性和明确的指向性。同时提出两个根本性转变，将经济体制转变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结合起来，是实践探索带来的认识的深化。会议同时指出，实现经济增长方式根本性转变的关键，是构建相应的经济机制，即依靠经济体制改革，形成有利于节约资源、降低消耗、增加效益的企业经营机制，有利于自主创新的技术进步机制，有利于市场公平竞争和资源优化配置的经济运行机制。这是第一次明确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推进机制。此外，会议还明确提出，“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把实现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重大战略”^②，标志着可持续发展战略正式形成。至此，探索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新理论正式形成。

（三）“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理论的理论与历史特征

“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相对于“经济建设新路子”来说，理论特征发生显著变化。从转变发展方式的主要目标来看，强调经济增长从以粗放为主向以集约为主转变，同时兼具环保目标；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基础来看，明确将“三步走”战略作为战略基础；从转变发展方式所需的体制环境来看，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从转变发展方式的实现途径来看，在将市场化改革作为转变发展方式的根本途径的同时，进一步将具体实现途径由“十条经济建设方针”凝炼为科技进步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推进机制来看，第一次明确提出了

实现发展方式转变的经济机制，即技术进步机制、企业经营机制和经济运行机制。可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是对“经济建设新路子”理论的继承与发展，是就如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第一次系统性阐述，为全面的发展方式转变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本格局，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历史地位。

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是中国共产党针对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经济增长质量不高这一突出矛盾提出的，因而该范畴具有显著的“增长”特征，而对于“增长”基础上的“发展”问题则关注不够。譬如，同期形成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在该理论中就未得到足够的反映。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虽然也具有环保内涵，但主要是技术层面的，并没有提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机制；而仅通过技术进步，是难以有效解决因能源消费结构、消费模式等因素导致的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的。同时，这一时期经济发展中日渐显现的收入差距过大、过于依赖外需拉动经济增长等问题，也同样没有得到足够的理论关照。

由此，回顾前述两种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理论，我们不难发现，中国共产党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探索都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中，针对发展中存在的特定的历史性矛盾展开的，因而都是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并因此具备了特定的理论特征和历史内涵。也正因此，在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理论提出之后，随着历史条件和历史性矛盾的转变，中国共产党关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探索又转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四、形成：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逐渐显现的一系列问题，在新世纪初集中涌现，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出了新的要求。于是，中国共产党继续推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理论探索，

^① 《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第1384页。

^② 《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第1463页。

并于2007年在中共十七大上正式提出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从而最终形成了全面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理论。

（一）提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理论的历史背景

1995年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实现经济增长方式根本性转变的要求，但具体实践未及充分展开，即遭遇了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风暴和1998年大洪灾的冲击，迫使中国不得不通过扩大政府投资、维持一部分低效率企业运转、恢复一部分落后产能、放松污染治理等手段来应对冲击。因而，到世纪之交，中国经济增长集约度虽有所提高，但经济增长方式仍未能实现根本性转变^①，经济增长粗放的问题依然非常突出。

与此同时，随着20世纪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建立和小康水平的基本实现、2001年底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及工业化再现重工业化趋势，中国经济发展迈入新的历史阶段。此时，长期积累形成的经济增长过于依赖外需、生态环境恶化、资源短缺、收入差距拉大、地区发展不平衡、城乡发展不平衡、“未富先老”、人口红利接近尾声、安全事故频发、就业问题、生产成本上升等发展方式存在的问题，日益成为新的突出矛盾。这表明，传统经济发展方式迟迟未能实现根本性转变所导致的主要矛盾，已从增长层面扩散到涉及经济、社会和自然的发展层面；不从根本上转变传统经济发展方式，就难以实现中国未来发展目标。此前提出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理论，显然已难以满足新时期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需要，构建新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理论，以尽快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已成当务之急。

（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理论的初步形成

面对上述问题，中国共产党在通过调整产业结构、构建科技创新机制、转变政府职能、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措施，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同时，积极探索新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理论。新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转变

经济发展方式的探索，也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

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前为第一个阶段。该阶段为全面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奠定了思想基础，提出了转变发展方式的战略基础、体制环境、主要目标与实现途径，新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理论框架初步形成。首先，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提出了一条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以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为特征和目标的新型工业化路子。新型工业化道路，是在中国工业化重现重工业化趋势、资源短缺和生态环境恶化日益加剧以及信息化成为工业化未来发展趋势的背景下，针对中国粗放型的传统工业化模式提出的。因而，新型工业化道路，要求工业化必须在提高工业发展质量和信息化水平的同时，兼顾传统工业发展、资源节约、环境保护和保障就业。这其实是从工业化的角度，对新的经济发展方式提出了要求。

随后，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决定，同时提出科学发展观，要求坚持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可持续发展，并将实现“五个统筹”（即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作为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主要途径。科学发展观拓展了新型工业化道路所蕴含的发展思想，是发展理念的重大转折，为新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理论提供了基本指导思想和主要目标。科学发展观要求实现全面可持续发展，实际上将可持续发展战略确立为未来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战略基础。作为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主要途径，“五个统筹”也就成为转变发展方式的具体实现途径。同时，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决定，则意味着经济发展方式的进一步转变，必须在

^① 1990年至1998年，综合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37.25%，1998年至2000年甚至有所下降，为28.14%，都远小于50%。见王金营《中国经济增长与综合要素生产率和人力资本需求》，《中国人口科学》2002年第2期。

完善的市场经济环境中完成。至此，构建新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理论所需的理论要素基本具备，新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理论已呼之欲出。

（三）“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理论的正式形成

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之后，通过进一步探索，中共提出了新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机制，并最终在中共十七大上正式提出了新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理论。如前所述，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机制一直未被提出，而本阶段不仅提出了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机制，进而还将其拓展为实现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可持续发展的机制。2004年3月，胡锦涛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首次提出“建立资源节约型国民经济体系和资源节约型社会”，从而初步表达了通过建构社会机制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在此基础上，2005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标志着建构社会机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基本确立。2006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建设和谐社会的提出，进一步将社会机制确立为实现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可持续发展的机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机制其实就是通过整合政府、市场和社会主体三方的力量，共同推进经济、社会、人及自然的全面可持续发展。这一时期，对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的一再强调，既是对科学发展观的继承和发展，也是在不断明确和突出发展方向转变的方向。

在上述一系列探索的基础上，2007年6月，胡锦涛在中共中央党校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关键要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取得重大新进展。”这是在中央重要领导人的讲话中，首次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提法。之后不久，中共十七大明确指出，“实现未来经济发展目标，关键要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取得重大进展”，而且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关系国民经济

全局紧迫而重大的战略任务”。这是在党的重要会议上第一次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提法，并将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升到战略高度来看待。中共十七大同时指出，要实现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目的，就必须在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型工业化道路和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方针的同时，促进经济增长实现“三个转变”，即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于是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途径上，提出了更为具体的“三个转变”思想。“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提出，标志着新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理论正式形成。

（四）“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理论的特征与成就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继提出“实现经济增长方式根本性转变”之后，中国共产党在探索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取得的又一重大理论成果。它是针对世纪之交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集中涌现的诸多突出矛盾提出的，因而比经济增长方式理论具有更丰富的理论内涵。从转变发展方式的主要目标来看，除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之外，还强调经济增长的内源性、可持续性和社会和谐，要求实现经济、社会、人与自然的全面可持续发展；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基础来看，可持续发展战略取代“三步走”战略，成为新的战略基础；从转变发展方式所需的体制环境来看，提出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从转变发展方式的实现途径来看，针对发展中存在的主要矛盾，提出了“五个统筹”和“三个转变”；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推进机制来看，用社会机制取代了经济机制。“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迄今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最新、最全面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理论。

迄今为止，中国共产党先后提出了“经济建设新路子”、“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

变”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三种关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理论。通过比较这三种理论，不难发现，中国共产党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涵与转变方式的认识是不断深化的：从强调提高经济效益，到以经济效益为中心，到转变经营方式，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再到新型工业化道路乃至实现科学发展，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要目标的认识不断深化；从在计划经济范畴内改革经济体制，到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再到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转变发展方式的体制环境的认识不断深化；从没有提出明确的转变机制，到提出经济机制，再到提出社会机制，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推进机制的认识不断深化；从转变工作方式到转变增长方式，再到转变发展方式，对转变方式的认识也不断深化。

中共十七大之后，中国刚刚铺开各项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措施，2008年即遭遇了大雪灾和空前的国际金融危机，中国经济受到严重冲击。这既延缓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进程，也使传统经济发展方式的弊端充分暴露，从而进一步加剧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紧迫性。2009年下半年，中国经济开始企稳向好，其他主要发达国家和大国经济也出现复苏迹象，中共中央迅即加快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脚步，并一再强调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性和紧迫性。2009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转变发展方式已“刻不容缓”。这次会议明确指出要统筹发展与发展方式转变，提出了转变发展方式是推进科学发展的“重要目标”和“战略举措”的定位，进一步提升了发展方式转变的战略地位。2010年2月，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加

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中国经济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关系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是中国共产党必须承担的“历史使命”。可见，中国共产党关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性的认识也不断深化，即从当初主要着眼于国民经济调整及后来的“三步走”战略的实施，上升到党的“历史使命”、“决定现代化命运的重大抉择”的战略高度来看待。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1978年以来，中国共产党一直努力从理论和实践上探索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然而，由于经济发展方式是特定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体制选择的结果，而战略和体制的转变，尤其是经济体制的转变，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从而从根本上决定了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再者，经济发展方式存在的问题也是随着经济发展而逐渐暴露的，这决定了人们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涵、转变方式及其重要性的认识，也只能随着实践的推进而逐步深化。此外，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风暴、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以及一系列重大自然灾害等国内外突发事件，则一再延迟了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进程。正是在上述种种原因的综合影响下，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至今未能实现根本性转变。时至今日，随着阻滞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发展战略、经济体制机制、认识局限等国内因素逐渐消解，以及国际经济逐步进入后危机时代，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有望迎来一个加速推进的时期。

（本文作者 张连辉，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讲师；赵凌云，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武汉 430073）

（责任编辑 朱昌裕）